

预言与危机

罗岗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预言与危机

罗岗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预言与危机/罗岗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308-14040-9

I. ①预… II. ①罗…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5563号

预言与危机

罗岗 著

责任编辑 叶 敏

营销编辑 李嘉慧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965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179千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040-9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 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tmall.com>

代序：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1935年元旦，第一次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在北京开幕，早在前一年的11月7日，鲁迅就在日记中记下了他为这次展览会送去了《木刻纪程》和木刻作品32件。展览会的组织者本打算从展出的作品中精选一部分出版《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并约请鲁迅为此专辑写序，后来因为当局的镇压，所选作品也因之失散，唯一幸存的是鲁迅亲笔所写序文的刻版，算是这次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遗留下的难得纪念品。在这篇序文中，鲁迅对新兴木刻予以了极关切的评价：“近五年来骤然兴起的木刻……它乃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要求，所以仅有若干青年们的一副铁笔和几块木板，便能发展得如此蓬蓬勃勃。它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这之前，有木刻了，却未曾有过这样的境界。”当时的木刻虽然幼小，却异常鲜活，从八十年后的今天回头看，“作者”与“大众”、“社会”和“内心”、“艺术”的“热诚”与“现代”的“魂魄”……之间的一致和贯通，始终是木刻能够深刻地把握历史、刻画现实和展望未来的动力。许江在为《重负和重觅——中国美术学院版画之路：1928—2011》（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作序时，之所以在文末特别注明“2011年8月17日脱稿，八十年前的今日正是鲁迅举办的木刻讲习会

开幕”，很显然是自觉地置身于这一伟大的传统中。

然而，鲁迅对这一传统的概括和体悟，并不局限于八十年前暴风雨般诞生的新兴木刻，早在一百年前，三十岁的“周树人”历经辛亥年间翻天覆地的革命，就萌动了将来如何以“艺术热诚”去展现“革命魂魄”的想法，这个“魂魄”寄生于那个叫“阿Q”的未庄农民身上，幻化为一次又一次“生命的瞬间”，挣扎在“不准革命”和“要求革命”的困境中。^[1]摆脱“困境”的方式，未必只有将“阿Q”视为有待启蒙的对象这一条路径，鲁迅对所谓“阿Q式革命”的反省，未必没有包含着对辛亥革命更激进的批判：如果一场革命不能容纳阿Q式的革命要求，那就算不得一场真正的革命！类似的思考青年毛泽东在1919年就以更直白犀利的话语表达过：“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剑拔弩张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2]

既然“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那么辛亥革命可以被轻率地描绘为一场“计划外的革命”，作为革命先声的“保路运动”也沦为了“地方利益集团”与“朝廷中央政权”争权夺利的“戏码”，由此引发的崩溃，才是革命的内因；^[3]也可以被庸俗地比附于英国的“光荣革命”，作为革命结果的中华民国的建立，如果没有清王室“屈辱而光荣地退位”，就不可能在拥有“未来中国的领土疆域之完整和巩固”，而作为这场“光荣革命”标志性成果的《清帝逊位诏书》，则被神化为“是对于晚近以来狭隘的革命建国的政治路线与衰颓的君主立宪的政治路线的一种新形式的整合与升华”。^[4]

于是，从“地方”与“中央”之争，不妨再回溯到“晚清十年新政”，

[1] 汪晖：“阿Q生命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载《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

[2]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载《湘江评论》，1919年第2至4期。

[3] 雪珥：《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年。

[4] 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虽然人人都意识到那是一个“山雨欲来”的时代^[1]，却未必能够明了为什么进一步的改革却触发了更大规模的革命。改革与革命的辩证法，正如傅勒接续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论题所指出的：“这个旧制度对于它所包含的现代性成分来说是太过于陈旧了，而对于它本身那种古老过时的东西来说又是太新了”，由此在晚清的最后十年，也就是20世纪最初的十年，“重重扩大起来的就是这个基本的矛盾。而这个制度对立的两极，即国家与社会，越来越难以相容了”；^[2]可是“一纸空文”的《清帝逊位诏书》不会显示出这种内在的深刻危机，而有可能被“去历史化”地解答为“在此存亡危机之关头，清王室能够果敢地接受辛亥革命之事实，屈辱而光荣地退位，将一个偌大的帝国疆域连同各族对于清王室的忠诚、臣服，和平地转让于中华民国”，因为继承了这个“偌大的帝国疆域”，“辛亥革命”的历史位置或许可以进一步让给清帝国治理下的、从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中华太平盛世”^[3]，这个被称之为“大清国”的多元族裔帝国确实有可能与通过这场革命建立起的中华民国之间构成“前生今世”的关联。不过，这一思路姑且不论其受北美“新清史”研究的影响，将清朝视为“多元族裔帝国”本身即包含了解构中国的危险^[4]，关键在于无法绕开辛亥革命的创新性，弥合起“五族君宪”与“五族共和”之间的根本差异与断裂。

如果充分意识到辛亥革命的创新性，那么孙中山依然是理解这场伟大“革命”的关键人物。就像杨国强在为沈渭滨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写的序言中所强调的：“近代中国以古今中西之争亘贯百年新陈代谢。这个过程产生了许多出众的思想和议论。但据我私见，具有完备形态并能影响

[1] 陆建德等：《山雨欲来：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

[2] 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孟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3] 杨昂：“中华太平盛世：清帝国治下的和平（1683—1799）”，载《政治与法律评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4] 刘凤云、刘文鹏：《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社会意识的理论则只有两个：一个是三民主义，一个是五四后三十年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当然超越了三民主义。然而同先于孙中山的人物和思潮相比，三民主义仍然有它耐读耐想的地方。”“先于孙中山的人物”如章太炎，考察他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言论，也有不少“耐读耐想的地方”，^[1]可若从“具有完备形态并能影响社会意识”来看，当然无法和孙中山相比。而在孙中山之后，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把他视为“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并在继承孙中山事业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新的“具有完备形态并能影响社会意识的理论”。倘若没有对这种革命传统的自觉继承，很难想象1921年7月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共一大13位国内出席者代表的全国党员只有57人^[2]——如何再一次取得革命的胜利，完成了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二次共和”。

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学者竹内好把孙中山和鲁迅视为精神上的同调者，可谓别具慧眼。在鲁迅那儿，从“阿Q”出发的辛亥革命反思，还可以进一步推衍出对能将阿Q的要求容纳进去的、新的革命的呼唤。从1931年开始，鲁迅倡导木刻，就是因为他在这种新兴的艺术样式中发现了将新的革命要求“形式化”的可能，他称之为是一种“未曾有过的境界”：“这就是所以为新兴木刻的缘故，也是所以为大众所支持的原因。血脉相通，当然不会被漠视。所以木刻不但淆乱了雅俗之辩而已，实在还有更光明、更伟大的视野在它的前面。”^[3]

2011年12月16日，上海

[1] 章太炎、章念驰：《章太炎演讲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2]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1917年11月—1923年7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3] 鲁迅：“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载《且介亭杂文二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

目 录

第一辑 漫长革命

- 一、再生与毁灭之地：上海的殖民经验与空间生产
——纪念上海开埠 160 周年（1843—2003） 3
- 二、1916 年：民国危机与五四新文化的展开
——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 90 周年（1919—2009） 24
- 三、幻灯片·翻译官·主体性
——纪念鲁迅先生诞辰 130 周年（1881—2011） 38
- 四、消失的“红墨水”
——以“电视剧”为“方法” 63
- 五、中国大学的自我主张
——纪念高考恢复 30 周年（1977—2007） 71

第二辑 短暂年代

- 六、“读什么”与“怎么读”
——纪念“新时期文学 30 年”和“当代文学 60 年” 89
- 七、“前三年”与“后三年”
——“重返 80 年代”的另一种方式 108

八、预言与危机：重返“人文精神讨论”	121
--------------------	-----

九、“短暂的 90 年代”与当代文化研究的使命	138
-------------------------	-----

第三辑 自东徂西

十、文学与侵略战争

——也谈“竹内好悖论”	147
-------------	-----

十一、革命、传统与中国的“现代”

——沟口雄三的思想遗产	159
-------------	-----

十二、如何重新规划普遍性？

——柄谷行人《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的与“独特普遍性”的构想	166
-------------------------------	-----

十三、何种幸福，怎样完美？

——《窄门》的难题与启示	201
--------------	-----

十四、“机器论”、资本的限制与“列宁主义”的复归	210
--------------------------	-----

第一辑 漫长革命

一、再生与毁灭之地：上海的殖民经验与空间生产

——纪念上海开埠 160 周年（1843—2003）

空间里弥散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

——亨利·列斐伏尔

—

姚公鹤在《上海闲话》中曾经感叹道：“上海兵事几经三次：第一次道光时英人之役，为上海开埠之造因；第二次咸丰初刘丽川之役，为华界人民聚居上海租界之造因；第三次咸丰末太平军之役，为江浙及长江一带人民聚居上海租界之造因。经一次兵事，则租界繁荣一次。……租界一隅，平时为大商埠，乱时为极乐园。昔《洛阳名园记序》称天下盛衰视洛阳，洛阳之盛衰视名园之兴废，吾于上海则亦曰：天下之治乱视上海，上海之治乱视租界，盖世变系焉。”^[1] 他的感叹虽然不脱“治乱、盛衰、兴废”的老套，却也相当显豁地把上海“繁

[1] 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0页。

荣”的历史带入到绵延不绝的“暴力”语境之中。更重要的是，构成这一语境的不仅是一场又一场突如其来的“兵事”，而且在这个语境中，与频繁“兵事”相呼应的，那种让姚公鹤感叹不已的，似乎有悖常理的上海发展“规律”，其实和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暴力系统密切相关。

很显然，所谓“日益全球化的暴力系统”指的就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作为两者的结合形态以暴力形式改写了世界历史的形态，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历史不再是两个毫无关联的时间过程，而是彼此交织成一个共同的空间场域。正如爱德华·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指出的：“……帝国主义的历史经验首先是一种不同历史互为依存，不同领域相互交叠的现象，其次是一种要求作出思想和政治选择的现象。例如，如果把法国和阿尔及利亚或越南的历史，加勒比海、非洲或印度和英国历史分开来研究而不是摆在一起看，那么支配和被支配的经验就会被人为地、错误地拆开。”^[1]同样，离开了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殖民扩张，就无法理解上海开埠以后的历史，特别是隐含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的“支配和被支配的经验”。而安东尼·金则更进一步指出，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历史与现状的讨论中，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经验常常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实际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在1500—1950年之间都被欧洲列强所殖民，这些殖民城市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才获得独立。因此他建议，如果要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些城市的状况，就必须把这些城市的“殖民城市”阶段和“全球或世界城市”阶段联系起来考察与研究。^[2]但是，在目前颇为流行的历史叙述中，上海的“殖民经验”还是被有

[1] 参见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 Said):《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一书“导论”部分的相关论述，蔡源林译，台北，立绪文化事业公司，2001年。赛义德又译为“萨义德”。

[2] 参见Anthony King, *Urb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World-economy: Cultural and Spatial Foundations of the World Urban System*, London: Routledge, 1990.

意无意地改写、涂抹、忽略甚至遗忘。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近些年来“张爱玲热”与“上海热”互为表里，相互生产，可是却少有人论及张爱玲作品中呈现出来的殖民经验。即使有论者提到张爱玲与殖民城市的关系，也没有仔细区分张爱玲是如何利用上海和香港作为不同的殖民地类型，在作品中建构起互相“张看”的视点，更无法顾及从“租界”到“沦陷区”，上海殖民管治方式的变化又会怎样激发起张爱玲以“文学”穿透“历史”的想象力。从一个更大的方面来看，渐成显学的“张爱玲研究”对“殖民经验”的“盲视”，只不过是当今历史叙述中“殖民主义健忘症”的一个小小的表征罢了！

当然，在这里重新强调上海历史和殖民主义的内在关联，并非把殖民主义视为一个空洞化、同质性的术语，试图以此来锁闭历史的叙述。一方面，上海在开埠之前已经成为了“海外百货俱集”的东南都会了，它之所以在“五口通商”之后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原来业已形成的经济、贸易和交通网络的支持。把上海发展的历史神话般描述为从江浜小渔村如何一跃而成为国际大都市，不仅在微观的层次上重弹“冲击—回应”的老调，强化了中国“没有历史”，迫切需要充满活力的西方“拯救”的想象，而且还隐含着另一层险恶的意识形态效果：借发展主义的神话将殖民主义匿名化、合法化了。另一方面，作为历史过程的殖民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整齐统一的规划，它并没有某种固定不变的模式，往往根据不同殖民地的特殊情形生产出新的管治方法、手段和技术，甚至派生出似乎与传统殖民地颇有出入的新统治模式，充分地显示出了殖民治理权力的灵活性和多样性。譬如，研究19世纪殖民主义的历史一般都把眼光集中在非洲、印度和加勒比海地区，对南北美洲却往往视而不见，因为在美洲拉开19世纪序幕的不是殖民主义而是独立运动，即早在16世纪帝国主义的第一次浪潮中建立起来的帝国的解体。然而继续深究这一蔓延美洲的独立运动，不

难发现潜藏其后的是一种“非领土性”的殖民主义新形式，它的动力来自于英、法帝国主义的殖民新战略。西班牙属美洲国家的最终得以独立，依靠的是英国和法国军队在关键时刻的支持。这些国家的独立恰好意味着为英、法帝国主义的资本、商品和技术在美洲找到了市场、原料和金融伙伴。于是，从殖民扩张的全球战略来看，帝国主义既在非洲进行疯狂的殖民掠夺，同时又在美洲竭力促成独立运动，两种殖民方式都完满地服务于帝国主义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张的根本利益。

二

基于一种对殖民主义较为复杂的理解，上海的殖民经验不能像过去那样用诸如“帝国主义侵略”之类的套话轻易打发掉。相反，应该充分注意到殖民主义是如何在上海“在地化”的，也即“租界”——上海所谓“租界”其实指的是“居留地”。它的英文表述为 settlement，从其动词 settle（安顿、居留之意）而来，因此，这个词更准确的中文表述应该是“居留地”，意为该地区内允许外侨私人租地居留，租地的手续是由各地侨商直接向中国当地的原业主商租。它与“租界”（concession）的区别在于，后者是中国政府将一个地区内所有的土地整个租给外国政府，再由外国政府将该地段分租给该国侨商。例如汉口、天津的租界。^[1]虽然习惯上还是把两者统一称为租界，但租地方式的差异并非不重要，上海殖民地在空间扩张上之所以比汉口、天津来得便捷、容易和迅猛，与此密切相关。——作为一种相当特殊的殖民

[1] 根据当时的国际法，“租界”（concession）指订立永远租约，将整个地段租与一租赁国，再由该国转分租给侨民居住，该国向中国政府纳总税，而外侨又向领事署纳税。地契由该国领事发给并登记。界内也由该国管理，常以该国领事为该地行政长官；“居留地”（settlement）则为双方订约，规定在通商口岸划定界限，在该界限内容许订约国人民租地居住。外侨租地是直接向华人原业主商议，商议成功以后，可以请求中国地方官发给契据。外侨直接向中国政府纳税，而非向外国领事馆纳税。参见陈三井：“上海法租界之设定及其反响”，载《近代中国变局下的上海》，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第3—17页。

地形式，是如何“镶嵌”进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脉络中，继而采用何种策略规划、改造和重建了原有的社会脉络？同时，原有社会又是采用怎样的方式来回应、排拒和抵抗这种殖民改造的？具体而言，租界对土地的直接诉求，凸现了殖民主义侵略性的特质——对空间的掠夺、占有和改造。因此，租界和原有社会之间的冲突和重组都较为集中地体现在空间面向的争夺上。

但以往人们常常是在诸如“现代”与“传统”碰撞之类的“时间”框架内解释这种“空间”冲突，进而赋予“现代”以某种不言自明的合法性。将时间凌驾于空间之上的论述，不仅正当化了通过缺乏空间感的直线进化论来观察世界的做法，而且运用“以时间消灭空间”（annihilation of space by time）的策略进一步抹去了原有社会的主体性，强调殖民主义即使作为一种“恶”的力量，也具有将“传统”带入“现代”的莫大功劳。例如，在描述上海进入“现代”的状况时，很多研究者都愿意引用马克思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一段经典论述：“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至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并且以这一经典论述为出发点，在不同的历史叙述框架中——如“革命史观”或“现代化史观”——把上海理解为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或前现代向现代过渡的关节点。在具体的历史论述中，两种史观或许时有冲突，但就最终的结论而言，它们都认定由于上海的出现，中国似乎摆脱了“没有历史”的状态而进入到“世界历史”之中。

[1] 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卷第2—3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页。

尽管马克思在道义上反对英国对中国的侵略，但他把中国比喻为“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而把帝国的人侵想象成“新鲜空气”，还是不经意间流露出一在东西方关系问题上，他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欧洲“现代化”论者。而正是出于对“现代化”（“革命”也是“现代化”的另一种形态）的迷信，使得“时间”取代了“空间”成为现代历史叙述中毋庸置疑的前提。不过，近年来这一前提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约翰尼斯·费边在《时间与非我》一书中，就从“人类学如何构建其对象”的角度对这种时间观和历史观提出了挑战。他指出，人类学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对时间的进化论式的构想上，这种对时间的构想把“非我”（也即“非西方”）事先放在历史长河的“原始”那一端，以确立现代“我类”（也即“西方”）这一端文明之优越。这就是所谓“时间的空间化”，把那些距离“西方”（“我类”）较为遥远的“非西方”（非我）社会，认定为在文化、心智和社会组织上都处于较为原始的阶段，它们需要欧洲文明的帮助，才有可能进步到更为现代的阶段。正如费边所言，“在西方思想中，‘原始’本质上是一个时间概念，是一个范畴，而不是一个思考的对象”。体现在现代民族志中，即“西方”人类学家习惯性地吧“非西方”对象排斥在现时的历史时刻之外。在“田野工作”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共时性”的空间脱节，使得“非西方”的现实只有在被看作是“西方”的过去，才获得理解的可能和存在的意义。^[1]

用“时间的空间化”来否认“非西方”与“西方”之间空间的共时性联系，不仅正面阻止了西方人类学对其自身学术政治和知识历史的质疑，而且相当巧妙地在社会理论的层面把“西方”与“非西方”

[1] 参见约翰尼斯·费边（Johannes Fabian）在《时间与非我：人类学如何构建其对象》（*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一书中的相关论述。